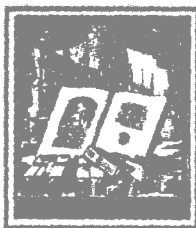


Hannah Arendt

1



故乡——科尼希贝格

汉娜·阿伦特的老家在科尼希贝格。这座小城在历史上曾有过它的荣耀。13世纪时，这里曾是东普鲁士的首都。16世纪，科尼希贝格成为普鲁士公爵的官邸所在地，河边的宫殿便成了城里最显赫的建筑。作为普鲁士首都的科尼希贝格，既充满生机，又不失恬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被德国军队包围，破城在即，只是由于俄国军队又杀了回来，才幸免于难，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先是犹太人，后是德国居民，都纷纷逃离了这座美丽的小城。

20世纪初，居住在这座小城里的大约有5千

左右。他们中的大部分本来居住在俄国，后来，为了逃避俄国反犹法律的迫害，才不得不乘火车逃难于此。

汉娜·阿伦特的外祖父亚克布·科恩，1838年出生于立陶宛。他是在1852年随父亲一起逃到科尼希贝格的。那时，沙皇尼古拉正准备将权力交给他的儿子亚力山大二世。1851年，尼古拉置西欧犹太人的抗议于不顾，强行将犹太人分为贫穷者和富有者两个等级。有钱的，备受社会青睐；无钱的只能去服兵役。在克里米亚战役中，许多士兵开小差逃到了国外。科恩的父亲当时就是一个临阵脱逃的士兵。他本是商人，来到科尼希贝格后，便重操旧业，开了一个茶叶进口商店。商店生意兴隆，最后竟完全打入了英国人控制的茶叶市场，扩大了俄国茶叶的经营范围。后来，亚克布·科恩接管了家庭产业，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发展成为科尼希贝格赫赫有名的食品公司。

亚克布·科恩与前妻有3个孩子。他的第二个妻子芬妮·施碧罗也是在那一年逃出俄国的。他们共养育了4个子女。1906年亚克布·科恩去世时，给妻子和7个儿女及孙辈后代留下了万贯家产。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通货膨胀爆发时，亚克布家仍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

汉娜小的时候，常去光顾外祖父家的食品商店，品尝自家生产的俄国风味小吃：杏仁糖果。这是她最喜欢的东西。

科尼希贝格在18世纪时，是柏林以外德国第二大犹太文化启蒙中心。城里建造了一所供犹太人就读的阿尔贝蒂娜大学。大部分犹太人都学习医学专业。

在受教育的犹太人中间，犹太启蒙运动的倡导者门德尔松有许多追随者，他们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派别。门德尔松提倡犹太人应融入德国文化，因此被非传统化的犹

太人视为新犹太文化的代表，而不再是一个政治上的流亡者。持这种观点的人中也包括汉娜·阿伦特的祖父马科思·阿伦特。

马科思·阿伦特的父母是在门德尔松时期举家迁往科尼希贝格的。在门德尔松病逝的 1786 年，普鲁士国王还没有作出取消普鲁士犹太人公民权的决定。后来，这个决定终于作出，这对那些积极争取犹太公民权的下层犹太人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然而国王的决定并不针对那些社会地位显赫且受过教育的犹太人。以后，许多人放弃了自己的犹太信仰，皈依基督教。

汉娜·阿伦特在她的《极权主义的根源》一书中称，这些人是从开始就不愿意做犹太人的。

1815 年以后，改变宗教信仰的潮流不断高涨，在犹太人之间，改革派与传统派的矛盾也随之激化。汉娜·阿伦特小的时候，科尼希贝格生活着一群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是大学社团的成员。1904 年成立了犹太大学生协会，学生们踊跃参加到该组织中来。老一代犹太人并不十分赞成复国主义的图谋，这其中就包括马科思·阿伦特。他是科尼希贝格市犹太社团领导人之一，德国公民犹太教总协会的成员。后来成为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领导人的库尔德·布鲁门菲尔特是汉娜·阿伦特的良师益友。他当学生的时候，就与马科思·阿伦特相识，俩人常常就一些问题进行唇枪舌剑的辩论。马科思·阿伦特概不接受有悖于自己观点的任何意见，他们的分歧显而易见。可是，争吵归争吵，布鲁门菲尔特依然是阿伦特家中的常客，他性情豪爽，善解人意，既是老阿伦特的朋友，又非常喜欢他的小孙女汉娜。每当他来家里，总是要和小汉娜围坐在地上玩上一会儿。

汉娜·阿伦特的父亲保罗·阿伦特是马科思与前妻约翰娜的唯一儿子。不管是保罗还是他的姐姐，都和父亲的第二个妻子合不来。姐姐后来去了柏林，嫁给了一个法国人。父亲的第二个妻子叫克拉拉，她是保罗母亲的妹妹。姐弟俩不太喜欢这位实际上是姨妈的继母。克拉拉从心里是疼爱这姐弟俩的，可就是不知该怎样做才合时宜，因而常常弄巧成拙。

保罗的妻子马塔·阿伦特出身于很有影响的科恩家族。她的母亲芬尼·科恩是一个文静贤淑的女子，讲德语时带着浓重的俄语口音，衣着也偏爱俄国乡村款式的长裙。科恩家的女人们都是宽容和善良的，这种性格对马塔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这个家族中，女人的数量远远超过男人，曾有若干女人经历过失去丈夫和孩子的痛苦。

保罗和马塔·阿伦特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所受的教育更多，见识也更广，在政治上更倾向于左派。20岁之前，他们就都成了社会主义者。那时，社会主义党派在德国还是遭到禁止的。他们的观点与同时代的其他多数德国民主党派的认识大相径庭。在阿尔贝蒂娜大学读工程学位的保罗·阿伦特，业余时间喜欢古典文学。在他的书房里，随处可见的是希腊语和拉丁语作品。后来，他的女儿汉娜·阿伦特对这些书也是同样的如醉如痴。

马塔和许多与她属于同一阶层的妇女一样，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而且还被送往国外学习。她在法国学习了3年的法语和音乐。汉娜·阿伦特的父母虽都不是教徒，可他们欣然同意女儿与祖父母一起去犹太教堂作礼拜。汉娜小时候，反犹太人倾向在科尼希贝格还不甚明显。犹太商人和知识分子集中居住在一个叫胡芬的城区里，城区边上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动物园。他们的小

康日子过得很是平静和安稳。工人阶层的犹太人，还有那些称自己为东部犹太人的俄国流亡者后代，住在城市的南部。不远处是一座带有拜占廷房顶的红砖结构建筑。中下层犹太人之间的交往甚少，他们的孩子能够考上完全中学也为数不多。整个学校的犹太学生，每班也不过三四个而已。

在省、市的政府机构中，几乎没有犹太人任职。但是，在一些较大的团体中，除了医生、律师、教师成员以外，也有一些平民犹太人被选为代表。犹太人是允许当大学教授的，但他们可以在大学里义务授课，也可以举办有关犹太知识的讲座。保罗和玛塔有一个很大的朋友圈，他们的父母也是一样。可眼下，这诸多朋友的文化层次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不再是商人，大多数已成为医生、律师、教育工作者和音乐家等知识分子。玛塔有一批开办幼儿园和学校的女友，其中包括施泰因女士和斯奇特尼克女士，后者是后来汉娜就读学校的校长。这些女士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因为，直到 1906 年阿尔贝蒂娜大学还不招收女生；可她们都受过师资培训。

到了玛塔这一代，出现了第一批女作家、女艺术家和女音乐家，从而在科尼希贝格出现了以妇女为主体的作家团体、室内乐小组和一些政治性组织。玛塔和她的女友们都努力去给自己的女儿创造接受教育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过去只有儿子才能享受到。

在中等阶层中，虽然有许多不信奉宗教的犹太人，可是，他们无法摆脱犹太教所带给他们的阴影。汉娜·阿伦特在学校里，或同小伙伴们做游戏时，就常常被窃窃议及她的犹太身分，她会常常听到其他孩子的莫名其妙的议论。一天，汉娜从学校回家，告诉母亲，学校里的一个同

学说，是她的祖父杀死了上帝。她问母亲，果真是这样吗？

汉娜·阿伦特后来是这样谈这段经历的：

我出生在一个古老的科尼希贝格家族。“犹太”这个词，在我小的时候从未引起我的注意。当我第一次对这个词的存在有所领悟的时候，是在大街上听到一些孩子关于犹太人的议论，我因此得到了启蒙。作为一个孩子，一个稍稍长大的孩子，第一次意识到，我长着一副犹太人的面孔，也就是说，我的长相与众不同。对此我的感觉非常强烈，但那绝不是自卑感，因为，对我来说，那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的母亲也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人，对这个问题的出现，她并没有大惊小怪。她自己是犹太人，她是不会容忍我否认我的犹太身分的。如果我这样做了，她会打我的耳光。事实表明，反犹思想已危及到犹太孩子的心灵。

我们家的教育方法也有别于其他家庭。如果老师在学校里散布了反犹言论，那么，我母亲则主张，我不要低头，一定要站出来保护自己，尽管那些言论并不是直接针对我的。有一次，他们又在讽刺那些东部犹太女生，我听了，立即站起身来，愤然离开了教室。回到家中，我把事情的经过详实地记录在一个本子上，又请母亲写上一封挂号信，给有关的人寄去。否则，我是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这一天我自然也不必到学校去上课了，这岂不是好事一桩！^①假如这反犹太人的言论出自学生们之口，那我就不对家里人讲，因为，讲了也无济于事。我母亲的观点

是：在孩子们当中遇到了麻烦，应设法自己保护自己。我就是这样在母亲的教育下来维护自尊的。^①

这是发生在童年时期的一件事情。汉娜·阿伦特第一次感受到反犹意识，但作为一名少女，她并没有将此视为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她的老师雅斯佩尔斯曾称赞她的坦然，因为有了母亲的保护和教育，才得以使她这样心胸宽广地健康成长。从她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阿伦特的无畏精神，她的这种品格曾影响了许多犹太人。

^① 《高斯记者访谈》，第 15 页

Hannah Arendt

2



“我们的孩子”

马塔·阿伦特对女儿实施的是系统的教育工程。她希望女儿能够正常健康地成长。这种理想实际上是一种德国的教育方式，而不是犹太式的。许多德国家庭都备有先祖大师们关于教育的书籍，甚至还有如何设计形象、筑造精神灵魂的指南。德国的父母们对自己的孩子寄予厚望，祈盼着走进校门的孩子将来个个有所作为，所以，家庭就应该为他们攀跃顶峰搭起云梯。

对女儿的成长，马塔·阿伦特有认真的记载。自女儿出生那天起，家里就准备了题名为《我们的孩子的日记簿》。其中记录着孩子的身高、每日的饮食情况和生活习

惯，记录着所患的疾病和治疗方法；另外，还记录着汉娜个性发展的特征以及她进步的足迹。看到女儿沿着正常的轨道健康、活泼、快乐地成长，父母的喜悦溢于言表。他们称她是个沐浴在灿烂阳光下的孩子。1906年10月14日汉娜·阿伦特呱呱坠地。时下，马塔和保罗住在距离汉诺威不远处的一座小城——林登。保罗·阿伦特当时在一家电器公司任职，收入颇丰。他们买下了一幢舒适的木结构小屋，还雇用了一个小保姆。汉娜出生后的头两个夏天，阿伦特一家经常外出旅行。据《我们的孩子》记载，他们曾去过哈尔茨山；还到过科尼希贝格看望双亲。另外，他们还保持着与柏林老朋友的联系。柏林是他们婚后曾住过的地方。亲戚朋友也常来汉诺威看望他们。

这是一个充满文化氛围的三口之家，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马塔·阿伦特弹得一手好钢琴；保罗也喜欢唱歌、朗诵、讲故事。就连小家伙汉娜也早早地乐于此道了。在北方的隆冬季节里，他们一家人依旧到附近的公园里散步，到大自然中去漫游。去享受那清新的空气，这是他们最高兴的时候。阿伦特一家和谐、平静地生活着，直到保罗·阿伦特患病为止。

从汉娜出生的第一天起，马塔·阿伦特就详尽地记录下了女儿的饮食情况：“汉娜出生后24小时，开始吃母乳，可她不懂得吸吮，还必须给她加一些茴香油。到了第4天，她终于能够吸吮了。”马塔的记录就像一本细细的流水帐，事无巨细，无一疏漏——从喂奶时间的长短、头疼脑热的次数，直至服药过程中所出现的困难和身体有何反应等等。夫妇俩每时每刻都在细细地观察着孩子的每一个变化，“汉娜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很安静的，可有时

却异乎寻常地活泼。出生后的头几个星期，我们就认定她的听觉没有任何障碍；眼睛对光的感觉敏锐，这我们也早已发现了，可面部的变化，我们是在第 7 个星期才感觉到的。我们感觉到了她的微笑，也许这是只有父母的心灵才会感觉到的微笑。^①

马塔·阿伦特真称得上是一个无以伦比的观察家，在她的身上体现了一个母亲对她的第一个孩子全部的爱。在今天，这种关心似乎有些过分，可这正是那个时代一种进步的体现。

马塔·阿伦特对孩子成长的观察，反映了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德国学校教育观念的更新，即对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科学观察。威·普莱尔根据观察自己孩子的实际经验，提出了一整套观察教育孩子的技巧与方法。1881 年他出版了一本题为《孩子的灵魂》的书并在莱比锡创建了一个观察、分析儿童成长的研究所。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许多关于儿童心理学的杂志也相继问世。在所有的妇女期刊上都刊登关于儿童教育的文章。其中一篇较有影响的文章，是心理学家施泰因夫妇所写。文章中阐述了他们培养三个子女的经验。这篇文章发表于 1914 年。他们的长子君特·施泰因于 1929 年与马塔·阿伦特的女儿汉娜·阿伦特结识，后与之结为伉俪。

马塔·阿伦特与中产阶层的朋友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子女教育的新方法。在她们这一代人中，已出现了由女性创建的幼儿园和小学。她们大力提倡女子去接受教育，那种只有男子才有权受教育的现象得到了改善。

《我们的孩子》中早期记录的是孩子身体发育的情

况，但也穿插着关于孩子智力发育的描述。从马塔的记录中可以看到汉娜·阿伦特的精神成长过程：

汉娜在 6 个月大的时候，就喜欢别人陪在身边，一岁的时候，她愿意和任何人在一起玩，从不怯生，只要身边有人在，她总会表现出特别高兴的样子。长到两岁，她变得性格开朗，玩起来很是开心，但从不愿意单独玩。有时，她也爱发脾气，可当你对她和颜悦色讲道理时，她便很快地安静下来。这表明，这是一个特别需要爱的小家伙。一岁的汉娜就有机缘听音乐了。她常常坐在钢琴旁听妈妈弹琴，有时，还会随着琴声哼唱几句。然而，后来她对音乐的兴趣似乎平平，远远比不上对其他活动的热情。尽管如此，母亲还是执著地教她唱歌。以后的事实表明，马塔的期望过高，远远高出了女儿的音乐天赋。在记录中她流露出了失望的情绪：“女儿又长了一岁她唱歌嗓门不小，可曲调错误百出，没有抑扬顿挫。”^①

直到 4 岁，汉娜的这种状况仍未有起色。此时的汉娜已长得又高又结实，常被误认为是一个小学生。虽然，她常常唱歌，且声音高亢，可是音调总唱不准。她虽然有了一定的节奏感，但她不善于模仿别人的声音。母亲虽不强迫女儿学习音乐，可她的失望是显而易见的。她不得不承认，在女儿身上的音乐教育是失败的。然而，她同时也发现了女儿的另一个优点：在学习唱歌的过程中，汉娜背熟了无数首歌的歌词；当别人唱起一首歌的时候，她立即就能说出歌曲的名称。

1910 年，保罗的健康每况愈下，他的梅毒病复发，无法继续工作了。一家人不得不搬回老家科尼希贝格。因

马塔·阿伦特：《我们的孩子》。

为家里有病人，汉娜的小伙伴们也就不能来她家那座紧靠动物园、掩映在绿荫之中的大房子玩了。幸好，汉娜可以在幼儿园里和其他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这样，她也就把幼儿园里的活动与习惯带回家里。每当和妈妈一起玩的时候，她总是要扮演老师的角色。

汉娜在幼儿园的进步令大人们赞叹不已。年仅 5 岁就能写能读了。幼儿园的老师也不得不对小汉娜刮目相看。虽然，汉娜缺乏音乐天赋，动手能力也比较差，但母亲却发现了女儿在理智上的早熟，她特别能够识别方位，记忆力好，观察能力强，对书和字母有着浓厚的兴趣。还是很小的时候，每当她在大街上看到数字与字母，她就会无休止地提问，直到记牢才肯罢休。她就是以这种方式学会了所有的字母和数字。

1913 年 8 月，汉娜上小学了。与幼儿园相比，现在的学校似乎更让汉娜喜欢。对学校的功课，她从来没有产生过丝毫的厌倦。在学习上她一点儿都不觉得吃力，她的数学尤其好，她的聪慧明显高于其他孩子。虽然音乐课上的听力和模仿能力不够出色，可乐理知识学得还可以。汉娜特别喜爱学校的那些女教师，她的班主任亚德小姐简直就是她崇拜的偶像。

与其他孩子一样，汉娜有一颗天真、稚嫩的童心，可父亲的疾病却给这幼小的心灵蒙上了阴影，使她显得更加早熟。对待生病的父亲，她有时俨然像个小母亲；有时又像一个幼儿园里的小老师。自从父亲生病以来，她似乎对那些漂亮的布娃娃全然失去了兴趣。放学回家，她就安安静静地看图画册和故事书。小朋友们不能来家里玩了，家中的气氛也使她变得多愁善感，在听到别人讲起伤心的事情时，她竟会为之动容，在一旁伤心落泪。

保罗·阿伦特年轻的时候得过梅毒。那时，还没有发明出治疗梅毒的药物，此病的治疗是靠一种传统的土办法：让病人体内产生高烧，企求杀死体内的病毒。

马塔·科恩与保罗·阿伦特在 1902 年结婚时对他的病情以及治疗情况均有所了解。婚后，他们是冒着危险生下汉娜的。幸好那时他的病并没有发作。然而，仅仅过了两年半，保罗·阿伦特的厄运袭来，不得不到科尼希贝格医学院附属医院再次接受治疗。这一次发病来势汹汹，1911 年春天，竟达到重症三期，并出现了合并症，中枢神经系统遭到了破坏，导致他行动困难。他很快就半身瘫痪了。这一年的整个夏天，保罗·阿伦特是在科尼希贝格的医院里度过的。

保罗在家人的眼中是个固执、不容易接近的人。他蓄着长长的黑胡子，长着一只罗马人的鼻子，一张过分严肃的面孔整日紧绷着，像个学者，似乎刻意要与人保持着距离。在妻子的眼里，他却是一个粗犷的男人，是个比她更有能力驾驭生活的人，尽管他不像马塔感情细腻，不会从内心去体察别人。

保罗在旧病复发的初期阶段，常常对女儿流露出烦躁的情绪，因为，两岁大的汉娜还不懂事，总要大人陪她玩。可每当看到女儿那甜甜的笑脸，他又感到无比欣慰，甚至喜欢听她那富有情感的哭声。5 岁的汉娜已经记事了，她记忆中的父亲，知识渊博、待人善良。保罗的病常给她的生活带来危险。一个孩子必须意识到这种危险的存在，这无疑是非常残酷的事情。就连陪父亲去公园散步，汉娜也要格外小心。因为，疾病已使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受到破坏，走路时，往往不能保持身体的平衡，他会突然摔倒在地。

马塔回忆说，汉娜很小就对父亲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她尽一个孩子的所能去帮助他，常和他一起打扑克，来分散他的注意力。母亲的记录中没有记载女儿在这段日子里的思想反应，然而，在汉娜·阿伦特青年时代的作品里却包含了她对这段时光的许多回忆。这表明，父亲的不幸给这个沐浴在阳光下的孩子所带来的痛苦要远远大于母亲的想象。

汉娜有一位慈祥、善良、会讲故事的祖父。每个星期天的上午，马科思·阿伦特总是和孙女在他家附近的公园里散步，他们一边走，一边讲故事。时间久了，这便形成了规律，反正汉娜每个周末都要和祖父母一起去犹太教堂做安息日祈祷的。祖父去世后很久，汉娜仍然常回忆起那段日子，对祖父给她朗诵的儿歌、讲述的故事记忆犹新。在父亲病重的时间里，祖父扮演了个父亲的角色。

Hannah Arendt

3



痛苦的年代

自 1911 年保罗·阿伦特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起，马塔·阿伦特的《我们的孩子》的记录也就此中断了。待记录重新开始，已时至 1914 年：

痛苦的年代已离我们远去了。孩子亲身经受了那场动人心魄的家变。而这一切都是她可怜父亲的疾病所致。在这动荡的日子里，孩子对她父亲所表现出的是尽其所能的爱，她甚至不允许我对他有任何不够耐心的话语。然而，她在内心里却祈祷着父亲早一点离去，以摆脱这无休止的痛苦折磨。她在

每天早晨和晚上都为他祈祷。家里没有人曾告诉她应该这样做。^①

汉娜常被带去医院看望父亲，直到他病人膏肓，神志恍惚。

马塔·阿伦特尽全力使女儿过正常人的生活。她开始给她上钢琴课，鼓励她去看望亲戚朋友，例如，去保罗同父异母的姐姐佛丽达家。佛丽达可是汉娜最喜欢的人，她常带着小汉娜去大自然里游玩。

1913 年对阿伦特一家来说是最痛苦的日子。先是 3 月份，身体原本健壮的祖父马科思·阿伦特却突然得暴病而死；接着父亲保罗·阿伦特在 10 月份也撒手人寰。祖父去世时，汉娜正患腮腺炎，她在床上整整躺了 3 个星期。对祖父的死，她显得麻木不仁。对那么多人前来参加祖父的葬礼她感到好奇。她喜欢大家送来的鲜花，她趴在窗口观望着为祖父送葬的浩浩长队，竟有这么多人跟随祖父的灵柩之后，她挺自豪的。在以后的日子里，她很少谈起祖父葬礼上的所见所闻，也从不愿提到祖父的名字，一位和她一起做游戏的大朋友。母亲对女儿的表现不知所措，她怀疑，汉娜是不是已忘记了她亲爱的祖父。直到有一天，她终于听到了汉娜的解释才放心来：“妈妈，你不要去想那些伤心的事，想了，你会更悲伤。”

保罗·阿伦特的死对母亲来说是最为伤心的事情，对此，汉娜心里明明白白。可她自己却表现得平静。她常用这样的话来安慰妈妈：“你该这样想，别人家也会发生这样事情的。”汉娜虽也参加了葬礼，也掉下了眼泪，可

^① 马塔·阿伦特：《我们的孩子》

她给人的感觉，那泪水是为葬礼上那凄楚的哀乐而流下的。

家里连续发生的这两次不幸，似乎并未对 7 岁的汉娜产生强烈的震动，这使马塔极为不安。对她后来的表现，马塔更是大惑不解：马科思·阿伦特去世以后，母亲陪祖母去巴黎小住数周；料理了保罗的丧事后，马塔又去外地疗养，这一去竟是几个月；和外祖母住在一起的汉娜，对母亲的存在与否似乎无所谓，她似乎从未有过想念妈妈的感情。每次马塔外出归来，她会发现汉娜总是那样兴高采烈，从未流露出一丝的眷恋之意。对女儿的冷漠，马塔不得其解。在那失去亲人的日子里，马塔无时不在经历着痛苦；而女儿对此却没有丝毫的感觉。马塔大失所望。她担心，女儿会成为—一个缺乏真挚情感、待人冷若冰霜的人。然而，—年以后，马塔发觉女儿的无忧无虑日益消失了，—一种莫名的深沉悄悄镀在了她的脸上——这时，她又为此忧虑起来。此时她最大的愿望，是让那天真、无邪和欢快重新回到女儿的脸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汉娜正和母亲一起在波罗的海岸边度假，住在科恩家的一座别墅里。战事燃起，她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了科尼希贝格。1914 年 8 月的最后几天是让人最揪心的日子。俄国人已兵临城下。她们担心科尼希贝格会被俄国人占领，于是，便避难到马塔的妹妹和三个外甥住的地方——柏林。德国军队把第一批俄国人打退至东部，并且移师到东南方向的松林山附近，以便拦截第二批俄国人的进攻。马塔一家是趁这当口乘火车离开科尼希贝格的。

9 月份，松林山附近发生了该地区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战役。正是由于这场战役，俄国士兵的推进遭到了